

緬華雜文集

曾冠英編著



前 话

本书有记事文、人物志、文史资料等，体裁各异，故题为缅甸華文集。

本书成册不多是专用以悼念许金荣、黄重远、林竹、巴宁、马寒冰等同志以及前辈老侨领而做出的。

鸣 谢

本书多年来多次承澳门康宁英女士、林清风先生及尤肖松先生姐等要全部承担出事宜，此种雅量高谊，殊深令人敬佩，冠英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承蒙李绍宗、郭惠兰、曾文勉、林仲明、李立红、李立云全力协助下而完成的。

目 录

- 1、抗日战争时期的缅甸华侨……………董孟雄 (1)
- 2、大金塔下中华魂——忆缅华抗日救亡活动的日子……曾冠英 (24)
- 3、悼念杨季庄同志……………曾冠英 (26)
- 4、足历海寓，心驰汉阙，碧血丹心，荣哀典册
——缅甸同盟分会张永福先生事略……………曾冠英 (28)
- 5、旅缅福建同乡会及各宗姓团体……………曾冠英 (30)
- 6、仰光各宗姓团体论略…………… (31)
- 7、侨教事业的丰碑
——略记缅甸南洋中学创办及其发展过程……………林 竹 (38)
- 8、奔腾的伊江水——记仰光励学社……………曾冠英 周蒂芸 (52)
- 9、缅甸华侨曾广庇父子事迹……………曾冠英 (55)
- 10、缅甸侨商曾上苑沧桑史 ……………陈仲明 曾营丁 (60)
- 11、缅华侨领曾顺续烈士 ……………曾冠英 (64)
- 12、缅华文化界杰出战士——巴宁……………曾冠英 (69)
- 13、马寒冰同志事略 ……………曾冠英 (76)
- 14、东海的一颗明珠——记陈月容同志革命事迹……………王英秀 (81)
- 15、缅甸华侨新闻事业记略 ……………黄重远 (88)
- 16、缅甸华商回顾 ……………曾冠英 (108)
- 17、缅甸仰光中国佛教学会概况附简介及其主要负责人
事迹 ……………曾冠英 (110)

- 18、仰光大金塔撷趣 曾冠英(114)
- 19、中缅两国人民友好源远流长
——忆周总理与缅甸友人共过泼水节欢度新年 曾冠英(115)
- 20、新年新年又新年 曾冠英(117)
- 21、缅甸赛龙舟趣谈 曾亦僧(118)
- 22、休闲雅集遗诗篇——记仰光高解福山寺 曾亦僧(119)
- 23、忆番平度中秋节 曾亦僧(121)
- 24、缅甸故都曼德勒 曾冠英(123)
- 25、缅甸“当约”人的婚俗 曾冠英(125)
- 26、泼水节 曾延丁(126)
- 27、缅甸南洋中学五十周年校庆寄怀 曾冠英(127)

抗日战争时期的缅甸华侨

董孟雄

“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归侨、侨眷和国外侨胞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荣辱。在民主革命时期，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有许许多多华侨毁家纾难，输财出力，和祖国人民并肩战斗”（1）。在这本光辉的史册里，不言而喻，也有一页是由缅甸华侨以赤血丹心写成的。由于他们侨居在近代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国家里，被奴役的亲身体受使他们对祖国的兴亡怀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更由于他们侨居在与祖国接壤的地区，因而与祖国近代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的联系要较其他地区的侨胞更为密切，更为直接一些。

抗日战争时期，是缅甸华侨史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不只是因为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继的关头，完全符合海外侨胞愿望地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新形势极大地调动了缅甸侨胞的爱国热忱，参加在由海内外中华儿女铸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而对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就缅甸社会自身来说，还因为经过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教育，也有了前此各个历史时期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巨大进步，在历史的征途中一步步由拥护团结御侮、坚决抗战到底，更积极地走向争取民主、进步，而成长为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力量。

这个课题涉及的方面较多，而笔者手边的资料十分有限，本文拟仅就缅甸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略作概述，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些探讨。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我国在缅甸的华侨总数并没有精确的统计记录。一般估计是约在三十万人左右（2）。但遍布于全缅各大小城镇和

山芭。广东、福建籍侨胞在缅甸华侨中人数最多，基本上聚居于下缅甸。侨居在上缅甸的华侨则绝大多数是云南籍。此外，还有一些散居的湖北、山东、广西、江苏、浙江等省的侨胞，但所占比重不大。为了团结互助谋求生存，缅甸华侨和各地华侨一样，很早就有了侨团的组织，其源流是先有洪门，继而出现宗亲和乡亲组织。前者有龙山堂、陈家馆、梅氏书室、古城会馆等等，后者有广东公司、福建公司、庆福宫、云南公司、江浙同乡会以至以县邑为单位组成的宁阳会馆、温陵会馆等。至于按职业建立的行会，以劳工为例，则有由木工组成的鲁班庙、铁工组成的敬德行、制革业组成的洪胜行等。结合这些错综的地缘、血缘和行业关系，又形成了店员多为闽籍、木工全为粤侨、矿工多为滇侨的局面。当然，不论是以地缘、宗亲、乡党或行帮为纽带组成的这些侨团，在保障侨胞生活利益方面都发挥过和发挥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然而，不难理解，这些全都具有为封建小生产者意识支配特点的组织，不论其规模如何，就广泛地团结全体华侨来说，便都带有局限性，甚至还会因门户宗派之见而有消极作用。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思潮的输入缅甸，在侨胞中虽也出现了一些和上述侨团并存，但性质已不尽相同的侨团，例如仰光的中华总商会、华侨教育总会以及缅甸华侨青年团和由各行业职工发起组织的华侨书记公会、华侨海员小组等组织。此外，还有政治性组织，如中国国民党驻缅总支部和曾活跃过一个时期的缅甸中华工党。至于为主持特定任务而组织的爱国侨团，则有华侨爱国共济会和为赞助北伐而组织的华侨北伐红十字后援会等等。但是，在受到殖民统治者严加管制和对华侨的爱国革命活动多方阻碍的压力下，一些进步侨团大都遭到残酷迫害或处于受政治混乱严重影响之中。因而，在抗战前，缅华社会始终还未能在组织上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缅华社会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是沉寂的。恰恰相反，与祖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有紧密联系的缅甸华侨，很早就已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从现有资料来看，远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伴随着个别革命者流亡到缅甸后，便已播下了火种。

例如1928年5月有“缅甸华侨济急团”向缅属各地侨胞号召过组织“反日会”，1929年“缅甸华侨反日联合会”也举行过召集各界纪念“五三”的活动，1931年9月在仰光成立过“反日救国总会”，1935年成立过“缅华各界救亡联合会”等等。不过，这些组织和活动的影响，在当时还不具备全侨规模，作为主流的持续程度也不能和抗战爆发后的情况相比，因而对这一段侨运曾推动缅华社会爱国热情逐步高涨的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其作用还有局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被不抵抗主义断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接着又越过长城踏入关内，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身居异城心怀祖国的缅甸华侨，忧心如焚，无不义愤填膺，就连仰光国民党内部的青年也开始出现了内部斗争。于是，团结起来，一致支持祖国抗战的要求形成主流，随之推动了缅华社会的救亡运动进入高潮。

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时期的开始。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自治会首先迅速发起捐款支援抗日将士，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及缅甸华商商会等团体也分别电请国民政府迅速出师抗日彻底抗战，由此揭开了缅甸华侨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页。从7月23日至8月5日，经过联络酝酿，“福建公司”、“广东公司”和“云南公司”等九十三个侨团在仰光召开了联席会议，组成“缅甸华侨救灾总会”作为领导全缅侨胞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机关，接着，缅属各地也相继纷纷成立了救灾分会，把三十余万缅甸华侨吸引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一支抗日救亡大军。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各国华侨在经济上的联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又完全一致的有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的共同心愿，为了加强领导，以充分发挥南洋一千一百万华侨爱国力量的作用，由马来亚侨领陈嘉庚倡导与印尼侨领庄西言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等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领导组织。这一建议立即获得了各地侨团响应。陈嘉庚先生主动承担了筹备工作，此后还肩负起主持统一领导南洋地区救亡运动的重任。“缅甸华侨救灾总会”积极地响应了这一倡议，参加了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的“南

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大会。自此，缅甸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便进一步地汇入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大海。

“缅甸救灾总会”的成立和“南侨总会”的组成，标志着在缅甸和在南洋业已形成华侨的抗日统一战线，南侨总会则是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因而，这是华侨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在有了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领导后，缅甸华侨中各党派、各地区、各行业和各种侨团内的侨胞，捐弃了前此的一切界嫌，共同担负起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争作贡献。由这时起，从事各项救亡活动的团体，犹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现(3)。

这些从事抗日救亡具体工作的团体组成后，使缅甸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了能以持久展开的组织保证，充分地发挥抗日统一战线内的巨大潜力。“他们在海外都各尽本身的责任，为祖国抗战效劳，既不虚张声势，也不沮丧动摇。他们办事尤能讲求效率，实事求是。这点大足为各国内机关所效法”(4)。各地救亡团体都大规模地展开了宣传活动，通过报刊和举行演讲会、报告会痛斥日寇的侵略暴行，宣讲抗战的重要意义，使侨胞们的爱国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奠定了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倒退的思想基础。歌咏和戏剧及学校教育，也都与救亡运动紧密结合，成为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还使缅甸社会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歌咏运动在起初只是在街头进行义卖或劝募筹款时用来打开局面的手段。但由于侨胞们心中已普遍积蓄着久已待发的报国深情，所以一旦由富有感染力的抗日歌声开启了闸门，立即产生强烈的共鸣。往往是演唱者越唱越激昂悲愤，受到感动的听众们的捐助也越来越热烈。从演唱歌曲的水平和歌咏队伍的发展来看，也反映着救亡宣传工作的深化：起初唱的是“全国总动员”、“卢沟桥”、“铁蹄下的歌女”等简单的独唱，进而是齐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激昂的歌曲，到1938年11月时已有了专门从事歌咏宣传的救亡歌咏团，后来又组成“吡咤合唱团”，再后就扩大到成立起拥有大型队伍的“歌联”。它在各界中都拥有群众基础，深受群众欢迎。

当时，在仰光，每天下午四时起在庆福宫广场和宁阳会馆便都有歌咏活动，然后举行演讲后。到1941年组成缅京华侨战时服务团时，歌咏运动的演唱水平已能正式演出“黄河大合唱”，曾在曼德礼、腊戍等地演出。

戏剧也是各社团进行宣传激励抗战情绪和筹款救灾的重要手段。从事戏剧活动的团体有仰光的天演剧社、巨轮社、乐天社、盖德社、五三社、妇女救灾会、中国佛学青年会、艺新票房、集美校友会、救亡宣传工作团及各学校和曼德礼的红棉剧社等。曾经演出过“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前夜”、“归人”、“血火中的上海”、“共赴国难”等剧目。他们除了在城市中的舞台上演出外，缅华宣传工作团还到内地巡回公演，曾在勃生演出“重逢”。戏剧活动的作用和效果与歌咏相同，但它还有另一重对缅华社会进行了改造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由于封建意识的桎梏，非职业演员的男女是不准同台演戏的。于是，男校演戏时的女角、女校演戏时的男角都只得反串。这一道封建藩篱终于在这一时期中，随着救亡宣传活动大规模地展开而被冲破。缅侨妇女通过积极参加救亡工作也解放了自己。

当时全缅甸的华侨学校约有三百七十余所，最高领导机关是缅甸华侨教育总会。“所有华侨学校不仅救国不忘读书，且皆实行读书不忘救国。学生在课余从事救亡宣传或进行义卖募捐。上至校长教员，下至七八岁的小学生，他们事实上都成为救灾总会领导下最实干的救亡工作者”（5）。

历史是一个庄严的大课堂，缅华社会正是由于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的摇篮里受到进步教育的熏陶，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培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忠诚不懈地为坚持抗战到底和谱写中华民族的新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推销公债、增筹捐款、义献物资，以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是海外赤子的卓著历史功勋。

财力、物力、人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贫弱的旧中国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资金不足症，战争爆发后，又因东南和华中一带相继失陷，沿海沿江的产业也受到巨大破坏和损失，因而全国财政收入锐减。可是，军费开支正急剧增大，外贸逆差则严重缺乏抵付手段，加上战时军需和民用物资的补给刻不容缓，如此种种构成了极为尖锐的矛盾。为了支持祖国长期抗战，来自海外的侨胞捐输，通过为祖国的战时财政经济输血，对直接增强抗战的物质力量和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坚定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八年，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仅以财政部的捐款资料为据所作的统计，华侨各年的捐款数字如下：(6)

年 份	单位：国币元 捐 款 数
1937	16,696,740
1938	41,672,186
1939	65,368,147
1940	123,804,874
1941	106,481,499
1942	69,677,147
1943	102,266,536
1944	212,374,205
1945	584,251,321

从上列资料可以看出：仅仅这一部分不完全统计的合计总数已达十三亿元以上，平均每年为一亿六千多万元。即使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上再作进一步的分析，也显然可见华侨的捐款在1941年前是急剧上升的，自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制造分裂掀起反共恶浪，引起了广大侨胞的强烈反对后，才使捐款直线上升的趋向发生变化。而且，如所周知，此后仍有相当数量的华侨捐款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或直接汇寄宋庆龄、廖承志等同志收转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其数字便不会由上列统计反映出来。所以，上述统计中华侨捐款自1941年后下降，并不说明其真正减少，而是历史地反映着侨胞的爱憎分明。他

们的捐输是与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紧密相连的。另据《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数字，则仅抗战头四年，华侨的救国捐款已达国币二十六亿元(7)。按此计算则年平均数是六亿五千万万元。我们倘若用这个数字来和这几年国民政府的军费实际支出数进行对比，就能够观察出华侨捐款在军费开支中负担的比重如下：(8)

单位：国币百万元		
年 份	军费支出数	华侨捐款负担军费的比重
1937	1,388	46.8%
1938	698	91.3%
1939	1,601	40.5%
1940	3,912	16.6%

由于缅甸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捐输的数字迄无完整的精确的统计，目前还缺乏系列资料来单独说明缅甸华侨捐款的情况，零星的记录则有全缅华侨救灾总会截至 1939 年 9 月 30 日，即在抗战的头两年内经该会汇回救国捐款总数为 297 万元(9)，又据黄重远同志告知，他所见到的另一资料是至日军南进救灾总会结束时，共捐得缅币约三百万盾，缅华文艺界抗日救亡联合会曾经由该会转交陕北公学三次汇款：第一次 1,208.33 元，第二次 1,554.44 元，之后又再汇了出 282.35 元。但到 1939 年后便受到了阻挠。该年 1 月 23 日，顽固派竟用行政院名义下令，借口所谓“未经核准”，要救灾总会“设法制止”。这种卑劣行径曾引起缅华侨极大的愤慨！

在救国公债的劝募方面，自 1937 年“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分会”成立后，即开始在各埠劝募。1938 年 8 月，该会又改组为“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继续劝募“国防公债”及“金公债”。侨胞们踊跃认购，甚至毁家纾难。例如仰光有些侨团为购买公债而变卖了会所，南安公会、温陵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三山会馆等全都如此。粤侨叶秋莲女士将仰光十三条街三十五号的私人房产连同她自己的首饰全部拍卖，不要债票，全数捐献给祖国。在这里还应该再补述一句：缅华社会所购的这些公债，后来是全部无偿地贡献给了祖国的。

筹集抗日捐款，有经常性的月捐和临时性为了特定用途，如赈灾、救济难童、购机、劳军、募寒衣、购药等而进行的募捐。月捐通常是在一个救亡机构成立时就议定的。例如全缅救灾总会成立时，一百多个参加单位各认每月捐缅币五盾。这一制度，自始至终执行得非常认真。这些团体“皆采民主集中制，由选出的理事或委员轮流办公。轮到那一天，自己必须抛去自己原有的业务而来为救国工作服务。假如缺席，一律须自动缴出罚金作为救国捐，并无怨尤。……这些罚款都每月汇寄国内，捐输抗战。经济上是点滴归公，有严密的会计制度及监察制度”（10）。至于特别捐的募集方式则多种多样，有以演出歌咏、戏剧、球赛的售票收入来筹募的，有在节日时举行一个仪式来自由捐献的，还有以节约的开支作献金的，例如节约废历新年的用费作献金。其中最为动人的是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运动。它的教育意义也最大。这种方式是由进行义卖者组成若干小队伍，在指定的地点向同胞们劝买义卖品。义卖品有鲜花、纸花、手工制品以至提供各种服务。尽管义卖品的价格是高出原价若干倍的，但由于义卖者是为爱国无私地来义务工作的，义买者也是凭自己的爱国心自愿捐助的，彼此都感到能为祖国出钱出力十分光荣，全都在其中倾注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有一位当年曾在缅甸目睹过华侨踊跃捐输实况的记者，作过如下报导：（11）

“记者于六日晚由仰光搭火车转赴泰缅边境时，在一个距大市不远的小站上，遇到一群当地华侨学校的小同学。他们在车厢内作五分钟鼓动演讲，劝谕乘客捐款，为祖国购机以抵御敌人的狂炸。他们的话说得许多华侨乘客都掉下了眼泪。大家解囊捐款，连一个印度工人也受感动，抢上来捐了半盾钱。他还抱起那个中国小学生来亲吻，并以英语大呼：“中国抗战胜利！”目送这群小同学下车，我深深地受了感动。看看表，时已午夜，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寒冷的大雾中……这情影即使在国内也不多见啊！”

“国内人对于侨胞总不免有一种错觉：一提起华侨，总想像出一位大腹贾，袋里的金钱铿锵作响。国内有什么需要物资上的补助，

总会想到华侨。好像问题一提 到财神菩萨之前，一切总能有救必应。其实，这种想法大错而特错。果然华侨中不乏富家翁，但事实上这种富家翁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远适异国胼手胝足的劳苦大众。就旅缅的三十余万侨胞来说，富人只是少数而已。可是从为祖国抗战的出钱出力上讲，穷人未必让富人专美于前。南洋侨胞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回国慰劳将士时，曾言大批华侨捐款，其中大部分都是劳苦侨胞一分一毫的积聚而成。”

侨汇在华侨对于祖国战时财政经济所作的支援中，作用最为重大。笔者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多少年来很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至今在抗日战争史的篇章中，也仍未被认识到它是支持祖国长期抗战的重要保证之一。

自从 1935 年通过推行“法币政策”统一了全国的通货后，作为唯一合法通货执行着货币各种职能的法币的币值，便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战时，币值问题则更在根本上有能够直接决定战争实力强弱的作用。而法币是实行所谓“外汇本位制”的，即其币值受外汇比价控制。因而，只有掌握了充足的外汇头寸，才能谋求法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全国财经的全盘大局，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崩溃。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久已处在对外贸易入超的逆境中，根本无法由国内来保证必不可缺的外汇，于是不得不仰人鼻息。在这种逆境中，远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唯一能够缓和中国对外贸易逆差而又无损于国家权益的重要手段，就仅是侨汇。由此可知，它造福于国家民族之大。抗战爆发以后，我国出口贸易更加日趋萎缩，逆差更为扩大。直至南洋失陷以前，情况如下：(12)

单位：千美元

年 份	进口值	出口值	入超额
1938	86,388	59,454	-26,934
1939	39,077	21,283	-17,794
1940	67,133	14,947	-52,186
1941	135,952	19,973	-115,979

在这个时期中，由于英美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极少向华贷款。因而，除了侨汇外中国再也没有别的手段来抵付外贸逆差。可是，这时的外贸又因战争爆发的关系而已与战前不同，在直接贸易外，转口贸易和以货易货等形式在整个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大；加上这时连中国境内国统区、沦陷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也要通过出入口途径来实现，于是，掌握外汇头寸之重要更为突出。这就是说，在货币斗争这场听不见枪声的战场上，战斗的激烈，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逊于有枪声的战场，甚或更有过之。因为它是战略性关系全局和根本的问题。作为祖国的外汇净收入，侨汇不但是抵补外贸逆差以取得抗战必需的国外器材物资的主要手段，而且是谋求稳定法币币值，保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主要支柱。下表将侨汇与人超进行对比可以说明这一情况：(13)

单位：国币千元

年 份	全国侨汇数	全国贸易入超数	侨汇对人超的百分比
1937	473,502	115,130	411%
1938	644,074	123,559	521%
1939	1,270,173	306,407	414%
1940	1,328,610	57,032	2,329%

资料表明：在南洋失陷之前，不断增大的侨汇，不但为祖国抵偿了贸易入超，而且还能留有很大的余额，起着稳定法币币值和增强抗战实力的作用，成为支援祖国坚持抗战的有力保证。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用同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总支出和侨汇收入作个数量的对比：(14)

单位：国币百万元

年 份	财政总支出	全国侨汇数	侨汇占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
1937	2,091	473	22.6%
1938	1,169	644	55%
1939	2,797	1,270	45.4%
1940	5,288	1,328	25.1%

上述对比表明：南洋失陷前的侨汇，最高能够负担战时财政支

出一半以上，最低时也占四分之一左右。

尽管由于在侨汇方面也缺乏单独以缅甸华侨计算的资料，上述分析只好用包括缅甸华侨在内的全部侨汇总数来作说明。但从侨汇的作用和贡献来说，是不论任何地区的侨汇都具有同样意义的。

针对战时国内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缅甸华侨和其他各地侨胞一样，在巨款汇济祖国外，还募集或捐款购赠了大量物资。例如，为了加强祖国防空力量，由1938年起由各救运团体曾筹款献赠“缅甸华侨第一号”战斗机，福建女师校友会曾演剧筹款献机，仰光航空建设支会发起过一元献金购机运动。此后，又由各侨校募得缅币四万九千余盾购两架，命名机为“缅甸华侨学生第一、二号”。为了捐献救护车，1940年由缅甸救灾总会发动全缅侨团、学校献车一百辆，募得缅币十四万五千九百〇一盾，购车十辆编为“缅华学生第一号”至“第十号”。为了替前方将士和难童们征募寒衣和药品，缅甸救灾总会仅于1937年一年内就由红十字会或妇救会交海轮运回旧衣服七百捆左右，药品一百五十箱和棉毡、药棉、麻袋等。

鉴于沿海工业基地遭受破坏，后方经济落后，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来解决物资供应紧张的困难，以支持祖国长期抗战，许多华侨还集资回国兴办实业和银行。例如，南侨总会在重庆筹设大型制药厂，胡文虎等组建华侨建设公司在福建种植特产、增设工厂。缅甸华侨中也有王振相等集资兴办中南有限公司，在云南建胶轮复制厂，梁金山等集资在昆明举办侨民银公司，等等(15)。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侨资企业后来或者夭折或者成效不大，但是华侨殚思极虑报效祖国的赤忱丹心，却留照汗青，堪为后式。

三

回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向祖国提供各种急需的技术人才支持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缅甸华侨爱国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

缅甸华侨中的进步青年，很早就向往着西北抗日根据地。先后有康志荣、钟彩娥、朱荣辉、曹小茶、李国华等或由滇缅公路或取

道香港返国(16)。“缅华文化界救国后援会”也曾先后输送该会会员曾智明、林秋棠、李孝三、苏学新、许金荣、郑有礼等回国，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7)。次年6月，滇侨熊雨苍回国从戎，投考中央军校(18)。同年7月华侨教育会等十余侨团组成“中央第四军校第一期在仰招生委员会”招收华侨学员，经过学科考试于8月录取蔡蓉等六人返国入校(19)。1941年5月，又由该十余侨团组织考送华侨飞行军士委员会，输送人员加强祖国空军(20)。

为了选派抗战急需的技术人才，缅甸华侨的抗日救亡组织还专门为自愿回国参战或服务的青年组织了训练班，例如，1938年3月由张瑞隆等发起组织“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参加者约百余人，假宁阳会馆及武帝庙进行训练(21)，8月乘轮返国编入陆军特种工兵团。同年1月，“缅甸华侨筹赈委员会”主席及前主席林克逊、陈洪安、陈福星、王相尧等人发起组织“缅甸华侨救护队”，经过考试从报名者中录取了50名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由4月20日起进行了为期100天的培训，结业后，旅缅各界侨胞曾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送会，勉励全体队员英勇战斗。他们抵穗后，原定去长沙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报到的计划受到干扰，后来得到廖承志同志的帮助才开赴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广九路沿线，分为三个分队投入抢救和安置伤员的工作。仅一夜工夫，就救治轻重伤员百余人。深圳失守后，流离失所，一部份队员坚决要求北上抗日，经红十字会批准去贵阳经短期训练后分别编入54、56两支救护队。随56救护队开赴山西中条山的有李伯桂等，随54救护队到延安的有马学惠等。他们都参加了八路军兵站医院工作，深受军民欢迎(2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陈嘉庚先生领导下组织了“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会中设民众武装部、保卫团和宣传部等机构，组织义勇军赴前线抗敌。仰光集美校友会响应这一号召，集合仰光、曼德礼和由下缅甸来的许多青年，也在缅甸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队”，假借云南会馆展开工作。当时“中英印缅人士团结起来，消灭日寇！”、“华侨团结起来，保卫第二故乡！”的巨幅横标，曾横挂在市中心的广东大街上，抗日保缅的标语也贴遍了业已处在战火威胁下的仰光，